

中国民间诸神

上

● 吕宗力 栾保群 著



中国民间诸神



ISBN 7-5434-4043-1/B·22
定价 72.50 元(上、下)

36.25

B93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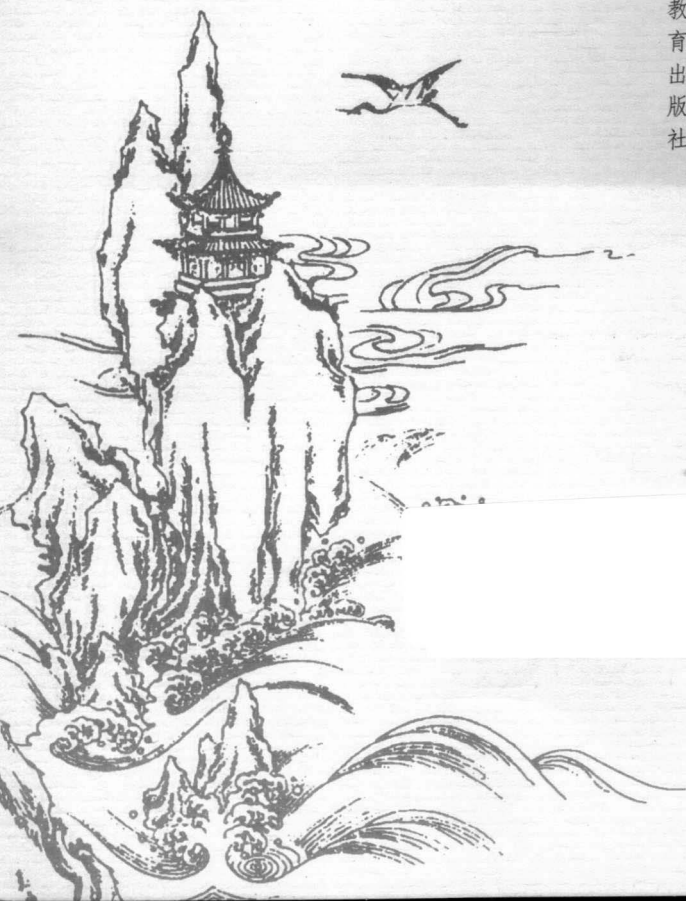
:1

中国民间诸神

吕宗力 栾保群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诸神/吕宗力,栾保群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0

ISBN 7-5434-4043-1

I. 中… II. ①吕… ②栾… III. 神-研究-中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663 号

书 名	中国民间诸神(上、下卷)
作 者	吕宗力 栾保群著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5.75
字 数	77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 7-5434-4043-1/B·22
定 价	72.50 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增补本前言

这是十四年前出版的《中国民间诸神》的增补本。所谓增补，是在原有的神名之下补充了一些新搜集的材料，这些新收的材料大约占本书的三分之一。此外也增加了少数神名，并对神祇的分类作了轻微调整，删去一些遴选不当及重复的材料，同时对各篇的案语也做了修正和补充。由于本书体例所限，这些神名之下的材料未能搜集完备。例如从碑铭、道藏、地方志、通俗小说、地方戏曲、民间宗教和秘密社会的经典，以及民俗与人类学者发表的调查报告等，应该还可以发掘出大量极有价值 and 有趣的文献资料。王秋桂、李丰楙教授主编、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国民间信仰丛书》第一辑（1989），收录了不少仙传小说。王秋桂教授主编、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的《民俗曲艺丛书》约 80 种，更收录了有关中国地方戏与仪式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多种田野调查报告、地方戏曲剧本和科仪本中，都保留有大量神名及相关的诸神信仰资料。读者及研究者如有深入了解的兴趣，不妨找出来看看。至于我们编纂此书时所特别关注的，是就散见于史书、笔记等传统文献中，搜检不便而有关民间诸神信仰的零星资料，钩沉辑遗，方便学界之研究。就此目的而言，经过是次增补，这一类较有价值 and 代表性的材料可说是遗漏不多了。本书未收录的其数近万的神鬼名目及材料，我们另编为《中国鬼神辞典》，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出版。

在 1984 年的初版叙言中，我们曾指出，对民间信仰的整理和研究对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史的研究深具意义。民间宗教与信仰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如鬼神、占卜、禁忌、巫术、秘密会社等等，并以千奇百怪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都发生着影响。但是这些自古以来活跃在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和思维习惯中的信仰方式，尽管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却由于种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未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古代文献中缺乏完整的记录。史家视之为怪力乱神，只可作为伟人的逸事，正史的点缀，或叛逆的妖征。文人视之为述异、猎奇的

“小说家言”，以之资谈兴、浇块磊，少有严肃、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反而是西方的汉学家，如 J. J. M. De Groot，在上世纪末著有六大册的《中国的宗教体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Leyden: E. J. Brill, 1892.)，以正史、四书五经和《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为依据，探讨了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祖先崇拜、自然崇拜、鬼神信仰、万物有灵信仰、巫术信仰等。本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持续辛勤耕耘。旅美华裔学者杨庆堃的《宗教与中国社会》(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Religious Behavi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虽然作于本世纪 60 年代，其中不少论点及研究方法也常受到后进学者的挑战，但其中有关中国民间宗教和信仰形式、分类、根源、功能的讨论仍然被公认为具有经典性。至于就特定区域(如福建、浙江、香港、台湾等)、特定时期(如汉、魏晋南北朝、唐、明、清等)、特定神祇(如西王母、天后、关帝、观音、城隍等)所作的田野与文献调查并举的专题研究，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著作吸收当代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对于理解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历史来源、社会意义、哲学和心理基础，其类型、状况、功能、以及与社会、社区、共同体之政治、经济、文化间的互动，具有相当的启发性。日本、台湾学者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也是硕果累累。

反观国内的相关研究，在 80 年代之前，前辈学者在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等领域中都著有具相当份量的专著。但就民间信仰的学术性研究而言，只有少量的专题探讨，缺乏综合性、整合性的著作。自《中国民间诸神》一书于 1986 年出版以后，各种研究中国鬼神信仰的论著佳作如林。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就收有一些很不错的有关特定民间神祇及巫术、禁忌信仰的专题性论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俗文丛》所收的一批特定神祇研究专著，定位似乎在学术与通俗之间，兼采文献及民俗、民族田野调查的资料，自有其特色。假以时日，当会出现更具整合性、系统性、理论性、思辩性的著作。坊间所见有关中国民间信仰的书籍，数量最多的当为一些通俗的关于鬼神的知识性读物以及音像制品。后者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是对社会基层民众影响最大的传播媒介之一。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些媒介在为民众提供赏心悦目的娱乐的同时，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把古代的故事传说注入新的人文思想，而不要把道士巫师的鬼话变成声光电气形式的“民间故事”。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都曾致力于神话研究，而他们的历

史小说《铸剑》、《石碣》等就是他们神话观的艺术化，是古代神话传说的现实主义再创造。尽管这些小说没有成为“世界名著”，但从眼力见地上起码不弱于莎翁。我们深切地盼望作家和艺术家们能从古代的武库中造出现代化的兵器，依然闪光的刀剑尚且需要磨砺，那些锈蚀的更应该抛弃或重新锻造。

葛兆光先生于1996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经历过数不清的“破除迷信”的风风雨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蛰伏状态，到了80年代，中国的民间信仰似乎又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和活动再次兴盛起来，从地下转入地上，迅速向50年代以前的状况恢复。（《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载《寻根》1996年第5期）我们自己于1996年夏天，获得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研究资助，也曾到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调查当地新旧庙宇及民间信仰活动的状况，得到的印象与葛先生完全相同。这些沉寂有年的“迷信”观念和活动形式本来似乎已经“失传”了，却又居然死灰复燃，好像连“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也未曾损伤它半根毫毛。而且它简单原始的观念与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播既形成强烈的反差，却又出现某种奇特的结合，电子计算机与算命，巫师与宇宙信息，股票与周易，古代神明与当代伟人，这些很难融合在一起的事物居然被一种奇怪的逻辑搅混在一起，而这种逻辑好像是一种潜伏在我们民族内心的神秘密码，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荒诞和不可理喻，但却很容易很自然地为我们所接受，虽然接受的内容和深浅程度不同。这使我们更加坚信原来的观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信仰（包括各种庸俗化的佛教和道教），始终是影响最大的宗教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存在于民间，也盛行于社会的上层。它所以能够不仅成为农民造反的旗帜，也可以被统治者作为统驭人民的缰索，被大小野心家作为蛊惑煽诱人心的工具，都不过是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民间宗教和信仰对历史上几乎所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发生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统的佛、道二教的一些内容和形式被民间宗教和信仰吸收、改造、同化，同时正统的佛、道二教又利用民间宗教和信仰改造自己，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居主动地位的常常是民间的信仰和宗教。我们只须看看在民间势力最大的神明观世音菩萨、吕纯阳、关圣帝君、玄武大帝、文昌帝君的来龙去脉就很清楚了。正统宗教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经典，而民间信仰却给这个民族的心灵烫下了难于磨灭的烙印。所以，将民间信仰贴上“迷信”、“荒诞”、“落后”的标签，一味禁

绝或打压，只是将复杂的文化、社会现象简单化，长远来看，无效亦无益。倒不如认真地做些调查研究，理清民间信仰的源头、发展趋势、历史脉络、文化背景、社会效果，揭示这种传统信仰的思想基础、心理机制和所代表的大众心态，再来探讨传统信仰与急剧变化中的现代社会行为、观念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它在现代社会整合过程中可能发挥的正面及负面作用，因势利导，化消极为积极，从根本上破除愚昧和迷信。

我们前面提过，好像连“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也未曾损伤民间信仰的半根毫毛。这个“好象”，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又可能是假象。贴近观察近年来复兴的民间信仰活动和仪式，我们会发现有些地区的一些活动和仪式只是看起来与几十年前完全相同，其实正如许多其他思想文化领域一样，也出现了断层。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只热心于修坟造庙，却不重视修路建校。这根本就不符合传统民间信仰入世济人的精神。宗教艺术当然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修庙塑佛自然也可能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但那些用水泥钢筋对古代宗教殿堂的粗劣仿造，千佛一面、形象呆板的泥胎有什么文化和经济价值可言？1983年，我们到四川峨眉山下的报国寺游览，见到一尊新塑的普贤菩萨，侧倚在卧倒在地上的白象身上，虽然当时还没有彩绘，但宝相庄严而又妩媚，令人感到一种慑心的美，那是一种现代意识和宗教艺术的美妙结合，完全不愧于太原晋祠、大同华严寺、昆明筇竹寺那些古代宗教艺术的珍品。但这种等级的宗教艺术品，现在实在是太少了，多起来的是完全商业化、与伪劣假冒产品同步的粗劣寺观和塑像。一些地方利用民众的鬼神信仰，修建了一种拼盘式的“庙宇”，把如来、观音、关帝、瘟神、马王、牛王等混居一堂，随便由香客各取所需；而这种神灵世界的超级市场，生意居然很兴隆！这一现象，也反映了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特色，很值得大家深思。

《中国民间诸神》出版之后，我们收到海内外一些师友同行的来信，他们热心地为这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终生难忘。现在这本《中国民间诸神》的增补本，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这些师友同行们协助而成的。所以我们谨向我们的恩师张政烺先生、王毓铨先生、张虎刚先生、李学勤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树平先生、胡小伟先生，台湾清华大学的王秋桂先生，中国美术学院的任道斌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荫柏先生，天津师范大学的高洪钧先生等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更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亚民先生，没有他的热心鼓励和慷慨协助，这部增补本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问世的。至于增补本的粗糙疏漏之处，还希望所有专家、读

者继续指正。

吕宗力 梁保群

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

补记：近日得知，峨嵋山报国寺的那尊普贤塑像早已被虔诚的佛弟子不知移往何处，那卧地的白象倒还保留着，在它身上又重塑了一尊千篇一律的立像。这大约是因为那尊普贤太女性化太迷人了吧。可是普贤、文殊与观音一样，本来就有女子之说，而山西平遥双林寺的二位菩萨像正是女身。于是我们想到：中国寺庙文化中的珍品的出世，不仅要有技艺高超的艺术家，还需要眼光卓越的宗教家；我们真应该向那位允许米盖朗琪罗在教堂里用人体来表现宗教故事的教皇致敬。

叙 言

两年前，我们曾打算和几位朋友一起编一本名叫《说神道鬼》的小书，目的是通过对一些在民间众所熟知的神、鬼的产生、形成过程的剖析，揭露一些民间信仰的迷信本质。当时准备写一、二十位神。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在搜集和讨论材料的过程中，这个专题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首先是这个专题如果深入研究起来，内容非常丰富，原来所设想的一本通俗性小书，收录一、二十位神的规模，显然与这个题目太不相称了。其次是这个专题非常重要，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然而以往对它的研究是太不够了。由于它属于“俗文化”的范畴，儒家又向有“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所以古代文献中缺乏完整的记载。六朝以来，尤其是唐宋以后，出现了一些专记鬼神妖怪故事的笔记作品，但古代文人视之为“小说家言”，多以“述异”为目的，很少有意识地对当时民间的神鬼信仰作一番系统整理。有些是出于宣传封建迷信的目的，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历代神仙通鉴》以及佛、道经典，其记载对于研究是有价值的，但科学性是根本谈不上的。明清以来，进行这种整理工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但多是偶有所闻所得，随手录之，或偶对某几个神感兴趣，下一番考证工夫，但并没有对民间主要的神鬼信仰作全面整理的打算。清代考据风盛，成就也大，许多读书札记涉及这一专题。其中贡献较大的，如翟灏的《通俗编》、赵翼的《陔余丛考》、俞樾的《茶香室丛钞》等，然而这些著作都不是专以考鬼神为事，所以内容虽较它书为丰，涉及的范围仍很有限。但他们对所论及的神鬼，确实下过不少工夫，作了系统整理，对这些神鬼信仰的源流的分析，也常有精到见解，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颇有启发。至于他们由于不可能掌握唯物史观的方法，所以难以对古代宗教意识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作出科学的阐述，甚至常有一些非科学的议论，则是不能苛求的。说到讨论考证民间信仰诸神之源流的专书，清代也有几种。较早的是李调元附于《新搜神记》中的《神考》。但该书篇幅不大，内容大半承袭翟灏《通俗编》。

光绪年间，常熟人姚福均作《铸鼎余闻》，搜集材料颇富，录神名八百余则，但材料排列次序甚乱，不成系统，考证亦多未确处。清末至民国年间，就此专题出过两种专著，作者都是教会中人，迄至当时，可算集大成之作了。一名《集说诠真》（光绪三十二年重校版），作者黄斐默，是上海圣方济教堂的司铎。该书所收神名虽不及《铸鼎余闻》多，但排列颇有次序，材料编排也较系统，较注意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诸神的源流也有考订，在这一专题的专著中，可算是比较好的一种。一名《破除迷信全书》，编者为李干忱，一九二九年由美以美会全国书报部出版，该书并不像《集说诠真》那样罗列材料，而是采取通俗的写法，介绍诸神信仰的源流和发展，其中有一些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两种书的共同缺点，除了所收神名较少，遗漏了不少在民间有影响的神，征引材料仍不够充分外，根本的缺陷，是它们都以破除中国民间多神信仰的迷信，宣扬基督教一神教的迷信为目的，所以考证往往显得偏执、奇特，除了个别具体论点以外，基本上是反科学的。

近三十年来，由于学者们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不再把生产力和一切经济关系仅仅看做是文化史的从属因素，从而对宗教学、民俗学等的研究出现了不少科学性强的成果。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方面，袁珂先生对古代神话、朱天顺先生对西汉以前的古代宗教所作的研究，都是很有启发性的。还有许多研究思想史、宗教史的学者，虽不专门注重民间信仰，但在他们的论著中，对此问题也时有涉及，其中不乏精辟独到的见解。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对某几个特定的神的源流及演变过程进行科学的剖析，很有价值。但是，我国近代民间信仰的众多神鬼仙佛，主要是从西汉以后尤其是唐宋以来发展起来的，这些信仰在现代中国仍有一定影响，或留有不少遗迹。现存的各种庙宇中所供奉的，主要是这些神灵。对这些神灵的信仰，不仅是一种宗教现象，也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民间文化、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不仅在中国人中，而且在日本、朝鲜、东南亚、南洋诸国人民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对这些民间信仰加以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追根溯源，探讨这些信仰从原型到现状的历史演变过程，并将之与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作出科学的阐述，则是一项重要而又工程浩大的研究任务，至今尚未见到这样的成果。以我们目前的功底、学力和识见之浅陋，当然是不可能胜任这样重大的任务的。但既然这个课题如此重要，空白点如此多，而我们对这方面的兴趣又如此浓厚，“不妨试一试”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虽然我们才疏学浅，见闻甚少，由于工作条件和时间、精力的限制，又很难博览群书，充分占有材

料，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也难以对诸神的源流演变真正作出准确的、科学的描述，但我们比起前人来，也有有利因素。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目前能看到一些前辈学者不易看到的书；我们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又可以利用当代学者研究古代宗教的理论成果。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试一试了。

很显然，这样一来，就不能把着眼点仅仅局限在破除迷信上了。对于影响民众思想达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信仰方式，简单地说是无稽之谈或归之于迷信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根据这种信仰方式所借以产生并持续发生影响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另一方面，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因素一旦形成以后，既会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变化，又会对周围环境在较长时期中发生反作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例如在近现代的民间信仰中，就可以发现不少原始宗教观念的影响和痕迹。对以上两种情况作出具体的科学的解释和阐述，是宗教学的重要任务，而我们对民间诸神信仰的源流发展状况加以搜集和系统整理，也将会为宗教学的这种解释和阐述提供丰富的例证和根据。不仅如此，民间从古至今的宗教意识的发展变化，诸神名称、形象、意义的发展变化，也生动地反映了普通人们宇宙观的变化过程，对于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也可提供一些重要的素材。

对民间信仰的整理和研究，也是文化史、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古代到近、现代，在漫长的岁月中，曾有种种宗教在中国活动着。从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到封建时代的国家宗教，以及民间流行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也有人把儒学称为儒教），它们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文化风俗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说实在的，中国的民间思想风俗，从未被某一种宗教统治过。中国的民间文化是兼容并蓄的，既保持传统的东西，也不拒绝外来的东西，只是无论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需因时、因地而加以适当的改造，使之适合各地民众的口味。到了近代，常有熔佛、道及传统鬼神于一炉的众神体系出现。老百姓中，真正虔诚的某教教徒数量不多，而一遇急难就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的大有人在。可以说，中国的民间信仰，是颇具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它已成为中国文化、思想、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持续到现在，达于海外。从事中国文化史、民俗学的研究，是不能不触及它的。推而广之，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如能比较深入地进行，对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间文学的研究都会提供一定的帮助。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的名山大川、古迹胜地，往往寺庙林立，供奉各种神灵，它们也都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在

破除迷信的同时，也有必要把这些遗产正确地介绍给年轻人和海外游人。所以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能对旅游工作者提供帮助。

所谓民间信仰，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民间所流行的各种神鬼、图腾、灵物、前兆、占卜、禁忌、祭祀仪式等信仰形式。而我们在本书将要涉及的，是神。所以将本书取名为《中国民间诸神》。关于本书所探讨的范围，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本书的着眼点，主要是近代以来在民间仍有较大影响的神，所以除了像医王（伏羲、神农、黄帝）、仓颉等仍被后世奉祀为神的以外，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一般不收。但我们在追溯某些自然神之来源，如海神、河神等时，或许会涉及某些古代神话人物，那只是为了弄清诸神的演变过程。二、我们之所以在“诸神”前面冠以“民间”的概念，是为了表示某些区别。首先是区别于“国家宗教”。这里所说的，并非指像西方那样统治某国意识形态的所谓“国教”。一般来说，古代国家的毁灭总要引起古代宗教的毁灭，某种宗教形式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基础一旦破坏，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要崩溃。但是一种文化因素一旦形成，又往往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中，这种持续性、传统性就表现得相当突出。正因为没有一种宗教能真正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成为帝王权力的威胁，所以中国古代的历代君主在宗教问题上总是宽容大量、兼收并蓄的，即使他们自己不信，也持“神道设教”的态度，只要有人信仰，便允许该信仰存在（近代统治者对天主教的态度是例外，因为那时的历史条件起了根本变化）。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由国家把战国时期各地主要的神灵都供奉起来（那些神灵信仰又有许多是自原始宗教继承下来的）。西汉统治者仍持这样态度，并进行过几次整理，使之与封建专制集权制度更相适应。当时这些信仰在民间是普遍流行的，所以统治者的这种做法有其实际的政治意义。但以后有些神灵继续流行于民间，而其形象、意义已有所变化，有许多神灵则已在民间消失，历代王朝却代代相承，使这些信仰仅仅存在于国家祀典（祭祀仪式）中，我们把这种信仰称为“国家宗教”，不予收录。“民间诸神”还有别于佛、道等宗教诸神。应该看到，佛教和道教（尤其是道教）为了传播的便利，也吸收了一部分民间神灵信仰的内容，佛、道教的诸神中，有一部分在民间也很有影响。但两教的神灵体系，与民间的诸神体系，并不是重合的。佛教中佛菩萨等神名极其复杂，中国民间所熟知的仅为其中若干种，而且还对这些外来神不断予以民族化、地方化的改造，如观音、弥勒佛、地藏王、阎罗王、天王、伽蓝等。道教的神灵，名目更加繁复，还有许多“仙人”，如彭祖、王子乔、安期生、容成公之类，虽然也很著名，文人骚客常

用为素材，但在民众中影响并不很大。而民间信仰的神灵除了有一部分来源于佛、道两教之外，还有其他来源（这一点以下还要谈到）。所以“民间诸神”有别于佛、道诸神。三、中国民间所信奉的神灵，数量、名目也是极多的，难以在本书篇幅中囊括。我们收录的标准，是自唐宋以迄近代，不仅见诸文献记载，而且在中国民间具有较广泛的影响，成为较大范围之地区（如一省或数省）乃至全国的普通民众之崇拜对象的神，这些神不仅见诸文献、流传乡里，而且大多被立庙奉祀，而且其庙不限于一县一乡。即或地方性很强，其庙限于一地，但影响也当远远超出该地之范围。也有个别神灵，其名望影响没有那样大，但与我们所收录的某神有密切关系，我们将其附载于该神之下。

经过这样的选择，我们在本书中共收录二百余则神名（其中有个别重复）。我们不敢说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祇已全部录入，毫无遗漏，但大概可以说，主要神祇大部分已录入本书了。我们对诸神的叙述次序，是按其起源的性质分门别类，列为十编。但由于诸神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性，也难免会有各个类别相互交叉的情形。按照古代宗教意识的发展规律，自然崇拜应是最早发生的。但我们考虑到近代对诸神的奉祀习惯，还是把民间信仰的最高神列为甲编。从乙编到己编，收录的是从自然崇拜发展而来的诸神，包括天体气象、土地（包括五祀）、山川河海、灵物、动物等神。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古代人类中自然崇拜是最早发展起来的，自然崇拜在初期是将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神化，不久又出现将自然神人格化和复杂化的复杂现象。将自然神人格化，开始是赋予自然神以人的形象、服饰、性格、意志、历史、姓名，以后又按人间的习俗为其找配偶，授职分工，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它们的面貌也不断发生变化。渐渐地，随着鬼魂崇拜的发达和自然神人化的强化，又出现了以人鬼代替自然神，行使其职能的现象，泰山神、黄河神、海神、江神等，都经历过这样的演变。唐宋以后，山川神的地盘有相当一部分被人鬼所侵占。这种现象在土地神（后土、城隍、土地）中尤其明显，可说是几乎全部为人鬼侵占。但由于这些人鬼神行使的是自然神的职能，它们代表了自然神演变过程的一个环节，所以不归在人鬼之类。比较起来，动物神中（除了西王母被道教利用而彻底仙化），或多或少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遗迹，使人们依略能据此想象出它们的起源和演变历程。庚编收录由鬼魂（中国传统上习称为人鬼）崇拜发展而来的诸神。鬼魂崇拜虽发生得稍迟一些，但与自然崇拜同为原始宗教的两大支柱。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宗法制度影响，祖先崇拜远较其他民族发达。与此相应，鬼魂崇拜也就尤其发达。所以民间

所信仰的诸神中，人鬼实占了主要的比重。它们当中有些被佛、道教吸收，但究其起源，并非由于两教的推崇在先，而是民间的崇祀在先，所以不归在仙、佛之类。辛编收录的神数量虽少一些，却也代表了民间诸神的一种来源。它们中有些源自道教，有些源自佛教，有些源自人鬼信仰，但一旦成为神后，其职能主要是社会性的，反映了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以后以及社会分工深化以后，人们对异己的社会力量的恐惧和迷信，壬、癸两编收录的是道教、佛教诸神中，在民间影响较大的神祇。关于各类神祇的起源、发展状况、社会背景及其特点，详见各编小叙，在此不重复了。我们在此还想指出一点：民间诸神的来源，如果细分起来，还不止这几类。例如有些神祇是由帝王想象出来，而后流向民间的；有些神祇出于某种误会，但因符合民间的迷信心理，于是也流传开来；尤其要说明的，是古代的神话故事以及经过文人加工的神怪小说，对于民间信仰能起相当大的作用。早的，如唐人小说中的柳毅；晚一点的，如《封神演义》、《西游记》中的各种神祇，对于民间诸神体系的形成，都发生过重大影响。如《茶香室四钞》卷二十引汤用中《翼骊稗编》云：“闻太师、申公豹，系《封神传》荒诞之言，乃恰克图四部祀之甚虔。……此与西藏唐僧、孙行者等师徒四众庙，闽省齐天大圣庙皆以寓言而为后世信奉，并著灵异。可知人心所向，神即因之，不必实有其人也。”然而我们所采取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古代宗教意识的特点，所以仍可归入各类，不必另行划分。

本书的编写体例，是按类别分成十编，各编都有小叙，介绍各类神祇的起源和发展状况及其特点。对诸神则先列素材及前人的考证、研究成果，后面附以案语，阐述我们对该神源流看法。凡是材料比较丰富，脉络比较分明的，我们尽可能在案语中提出自己的判断；情况比较复杂，诸说歧异的，我们或主一说，或存诸说以示疑；情况不分明，难以下结论的，一概存疑，不敢擅断。至于征引材料的编排，主要依据材料所反映的史实之年代早晚，及材料出处之年代先后。不少材料我们是转引的，编排次序时，以其原始出处的年代为依据。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有时又将阐述同一问题的材料集中在一起，这样就难免要打乱先后次序。这种情况并不很多，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能辨别出来，不致于造成混乱。在征引材料时，我们根据需要作了适当删节，但一般不加省略号。请读者注意。

我们在编写本书时，曾参考了不少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凡直接征引的，均注明出处，未直接征引的，我们也列入《征引及参考书目》中，以表示对前辈的感谢。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得到张政烺、王利器先生的鼓励和

帮助，并蒙张政烺先生为本书题签。李调元的《新搜神记》，传本甚少，不易得见，袁行云先生慨然惠示珍藏钞本，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我们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水平、功力和时间，又由于所涉及的领域是一大片生荒地，本书是比较粗糙的，不成熟的。粗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只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更多的同志研究这一专题的兴趣。同时我们也决不自甘浅陋，回避责任。我们恳请所有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各种批评、建议，或提供深入研究的线索，以冀今后三、五年内，把这本书修订得更象样子。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增补本前言 (1)

叙言 (6)

甲 编

小叙 (3)

三清 (4)

元始天尊 (7)

太上道君 (10)

太上老君 (11)

玉皇上帝 (23)

如来佛 (32)

乙 编

小叙 (37)

三官 (39)

玄武 (真武) (46)

附: 龟蛇二将 (62)

六丁六甲神 (63)

文昌 (66)

文昌神 (66)

文昌帝君 (梓潼帝君) (68)

附: 天聋地哑 (84)

奎星 (魁星) (85)

文曲星 武曲星 (90)

南斗 北斗 (91)

南斗 (91)

北斗 (92)

寿星 (南极老人) (99)

太岁 (102)

雷神 (111)

雷兽 (111)

雷师 (112)

雷公 (113)

雷州雷王 (119)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123)

雷部 (125)

邓元帅 (127)

辛元帅 (127)

庞元帅 (128)

刘天君 (129)

毕元帅 (130)

葛天君 (131)

石元帅 (131)

吕元帅 (132)

谢仙 (谢天君) (133)

袁千里 (134)

律令 (135)

电母 (闪电娘娘) (136)

风伯 (138)

雨师 (142)

丙 编

小叙 (147)